

在中国古代,除了个别的女诗人,比如李清照等以外,大多数诗人都不是女性,所以大部分的爱情诗,也都是男性诗人写的。但他们很少写男性对于女性的爱情,反而多是写女性对于男性的爱情。对于正常的男女关系中的感情,他们反而假冒女性的口吻说话,用女性口吻表达对于男性的爱情,由此产生了大量的“闺怨”诗。

“闺怨”诗有许多分支,其中的一个分支,专写商妇对于丈夫的思想,可以称为“商妇怨”诗。李白、李益、温庭筠等诗人,都曾写过“商妇怨”诗,以商妇的口吻传情达意。这类“商妇怨”诗的存在,是《琵琶行》出现的宏观背景。

在唐代诗歌里,“商妇怨”主要而且仅仅被表现为“等待”——那漫长的、不确定的、耐心的等待。由于商人是社会各阶层中流动性最大的阶层,商妇们也就成了最饱尝等待滋味的女人。“嫁得瞿塘贾,朝朝误妾期。早知潮有信,嫁与弄潮儿。”(李益《江南曲》)

然而我们看到,唐代诗歌中所表现的,仅仅是商妇们漫长而耐心的等待,而没有其他进一步的行动。她们对丈夫抱着满腔的爱情,也相信丈夫对于自己的爱情,因而从不怀疑等待本身的价值。即使对于丈夫有所抱怨和担心,那也只是因为爱得太深,而且表现得很有分寸。并且比起抱怨来,毋宁说担心更多一点。她们担心什么呢?一是经商的风险很大,二是到处都有闲花野草。

总之,这类诗歌中的女主人公,大都是典型的“好女人”。这些唐代诗歌,从大诗人李白到无名诗人之作,从不表现商妇对于商人的弃捐,从不表现憎恶或者鄙视的情绪,从不表现商妇面对其他男人的诱惑时的动心,从不表现商妇想要另外寻找安慰的“邪恶”念头。她们担心丈夫在外面会受到诱惑,但是她们自己从来不会接受诱惑。

不过,要想通过唐代诗歌去把握唐代现实中的商妇形象,还是有点危险的。很难想象整个唐代三百来年间,成千上万的商人和他们的家庭,会统一呈现出唐代诗歌里的样子。唐代成千上万的商妇,不可能用同一种声音说话,是诗人让她们这样说话的。我们只能把它们当作诗歌来看待,只能说当时的诗人喜欢这样写。至于诗人认得几个商妇,有多少现实生活的基础,这很难追问,也并不重要。从最伟大的诗人到最普通的诗人,他们可能全都按照某种套路来写。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,我们才能意识到《琵琶行》的与众不同。

二

在唐代上述“商妇怨”诗的背景下,我们发现《琵琶行》是一个另类,它完全离开了唐诗的一般套路,完全不同于当时的“商妇怨”诗。

《琵琶行》跟“商妇怨”诗的不同,首先是商妇的身份不再是普通的良家妇女,而是一个曾经走红、过气之后下嫁商人的名妓。其次,也是更为重要的,是增加了诗人的角色。原来唐代的“商妇怨”诗里,只有商妇一个角色出场,就像在舞台上演出独角戏;如果还有第二个角色,那就是不在场的商人,也就是商妇思念的对象;诗人自己大都不出场。可是白居易做出了一个重大的改变,他放弃了诗人在场外作为木偶操控人的身份,亲自下场去充当了舞台上的一个角色。商人

仍是不在场的隐形角色,但已不再是商妇思念的对象。于是,现在舞台上有了三个角色,整首诗的结构开始复杂化了,人物关系从简单的一对,增加到了六对:商妇对商人,诗人对商妇,诗人对商人,诗人、商妇对商人,商人夫妇对诗人,两个男人对一个女人。由此,《琵琶行》变身为一首富于戏剧性的诗,表现了诗人、商妇和不出场的商人这三个角色之间微妙的感情关系,成为中国文学史上表现商人、女人和士人三角关系的第一篇引人注目的作品,由此也创造了一种影响及于后世各种文体的新范式。

三

《琵琶行》写诗人在迁谪之地,邂逅一个本为长安名妓的商妇,对她的身世油然产生同情之感,并触发了自己的迁谪之意。这首诗歌的本事,有人说是纪实的,有人说是虚构的,但不管是纪实的抑是虚构的,其所表现的主题并没有什么不同,对于我们的论述来说也无关紧要。先来看其序:

元和十年,予左迁九江郡司马。明年秋,送客湓浦口,闻船中夜弹琵琶者,听其音,铮铮然有京都声。问其人,本长安倡女,尝学琵琶于穆、曹二善才。年长色衰,委身为贾人妇。遂命酒,使快弹数曲。曲罢,悯默。自叙少小时欢乐事,今漂沦憔悴,转徙于江湖间。予出官二年,恬然自安,感斯人言,是夕始觉有迁谪意。因为长句,歌以赠之,凡六百一十六言,命曰《琵琶行》。

唐代“商妇怨”诗里的商妇,都是两小无猜青梅竹马,你情我愿感情和谐,而这里的商妇原是长安名妓,年长色衰才委身为贾人妇的。在《琵琶行》里,每个角色都有一个旋律。商妇的旋律,已经被白居易定好了,即嫁给商人不是好事,而是命运的急剧下降,由峰顶跌落到了谷底。“少小时欢乐事”不是长干里的欢乐事,不是“郎骑竹马来,绕床弄青梅”(李白《长干行》)的欢乐事,而是曾作为长安名妓走红的欢乐事;现在则是“年长色衰,委身为贾人妇”,“漂沦憔悴,转徙于江湖间”。她的命运有一个今昔对比,从抛物线的顶端跌落了下来。

这其实是有违常识的。即使在今天一般的世俗观念当中,过气明星的最好出路还是“嫁入豪门”,把它看作较坏的遭遇,只能说是诗人的观点。这里有一个诗人的障眼法,他自己从长安被贬到浔阳,从京官被贬为地方官,他的命运是跌落的;于是,他认为商妇也是一样的,所谓“同是天涯沦落人”是也。

在此诗里,商妇的失意情绪和抱憾心理,通过自述表现得更为清晰了:

今年欢笑复明年,秋月春风等闲度。弟走从军阿姊死,暮去朝来颜色故。门前冷落鞍马稀,老大嫁作商人妇。商人重利轻别离,前月浮梁买茶去。去来江口守空船,绕船月明江水寒。夜深忽梦少年事,梦啼妆泪红阑干。

在唐代的“商妇怨”诗中,此诗是唯一表现出商妇对丈夫的不满与嫌恶的。在唐代其他“商妇怨”诗中,“重利”也好,“轻别离”也好,都不是商人的罪过,而是他们工作的性质,但在此诗里,就成为给商人“定罪”的证据。就连这个商妇的婚姻,本来也是不得已之举。因此,对于这个商妇来说,目前的生活,实在还比不上过去。

这一切当然都是诗人的创造,



邵毅平



他决定了商妇怎么看待她的身世,怎么看待她的商人丈夫和现在的生活。

四

诗人与商妇之间的感情关系又如何呢?诗人乃是自始至终同情这个商妇的。在此诗的序里,诗人就已把两人关系塑造得非常美妙了。这是一个充满感伤浪漫氛围的环境:一个从京师左迁外地的诗人,于一个秋天的夜晚,在芦苇萧瑟的江边,邂逅一个同是来自京师的商妇。那个商妇又弹得一手好琵琶,具有一段风流走红的历史,类似诗人曾经的仕宦经历。两个人的旋律高度相似又互相交织,于是从诗人心底,流露出了“他乡遇故知”的亲密之感,“同是天涯沦落人”的感伤之情,以及对于她“委身为贾人妇”的同情之心。这些情绪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,使我们隐隐地感受到了某种微妙的东西,那似乎是诗人和商妇间的一种亲密之感,以及两人对于商人的一种拒斥心理。三角关系当中的两角,现在有了高度的排他性。这样一种亲密关系,在唐代的“商妇怨”诗中是前所未有的。

其实,正是因为在这首诗里,诗人把自己的感情投射了进去,在里面充当了一个“自作多情”的角色,才引起了感情的偏移。“商人重利轻别离”,被冷落的商妇只有诗人来同情,从而反衬出诗人的“重情重别离”,这正是诗人所隐隐表现出来的情绪。于是在诗人听来,那商妇的琵琶之声,都像是在向他倾诉种种的不满——对于目前的处境,对于商妇的身份:

转轴拨弦三两声,未成曲调先有情。弦弦掩抑声声思,似诉平生不得意。低眉信手续续弹,说尽心中无限事。

商妇所倾诉的不满,只有诗人

能够理解,从这种相互的倾诉与理解之中,产生了一种“同党”式的亲密感觉,这就是诗人与商妇的心理呼应:

我闻琵琶已叹息,又闻此语重唧唧。同是天涯沦落人,相逢何必曾相识……感我此言良久立,却坐促弦弦转急。凄凄不似向前声,满座重闻皆掩泣。就中泣下谁最多?江州司马青衫湿!

显而易见,在此诗所表现的诗人、商妇与商人这三个角色之间的感情关系中,诗人与商妇互相理解,互相同情,诗人引商妇为同调,商妇也视诗人为知己;而对于那个不在场的商人,则都一致表现出嫌恶与轻视,把他摒弃在这个“两个人的江口”之外。在诗人看来,只有像自己这样的诗人,才能理解商妇的孤独与苦恼,才能鉴赏她的才能与风韵;而粗鄙、无情、重利、没文化的商人,则根本不懂这一切,因而也是根本配不上她的。这样有才华而敏感多情的女人,似乎本应是诗人的伴侣,而不应是商人的配偶。

——但她却嫁给了商人,而并没有嫁给诗人。

所有这一切,其实都出于诗人之手,是诗人想象力的产物(无论其基于实事抑或仅为虚构)。真正起作用的,是诗人对商人的排斥心理,这决定了他与商妇的共鸣。

五

《琵琶行》中商妇与商人糟糕的感情关系,不仅不同于同时代“商妇怨”诗中的,也不同于白居易另一首《盐商妇》诗中的:

盐商妇,多金帛,不事田农与蚕绩。南北东西不失家,风水为乡船作宅。本是扬州小家女,嫁得西江大商客。绿鬟富去金钗多,皓腕肥来银钏窄。前呼苍头后叱婢,问尔因何得如此。婿作盐商十五年,不属州县属天子。每年盐利入官时,少入官家多入私。官家利薄私家厚,盐铁尚书远不知。何况江头鱼米贱,红脸黄橙香稻饭。饱食浓妆倚柁楼,两朵红腮花欲绽。盐商妇,有幸嫁盐商。终朝美食食,终岁好衣裳。好衣美食来何处,亦须惭愧桑弘羊。桑弘羊,死已久,不独汉时今亦有。

能够“嫁得西江大商客”的“扬州小家女”,其身份是否如长干里的良家妇女,其实还是有点可疑的,但至少她的命运是往上走的,也因此对商人丈夫心存感激,这与《琵琶行》里的商妇形成了鲜明的对照。

但白居易在这首诗里,表面上写的是盐商妇的奢侈生活,其实意在提出自己的经济主张。他的经济主张,就是汉代桑弘羊的观点,主张盐铁由国家来经营,将其利润全部收归国有。反之,同样在汉代,司马迁的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,也提出了一个观点,即国家不要与民争利:“故善者因之,其次利道之,其次教诲之,其次整齐之,最下者与之争。”在汉代,这两种经济主张的斗争非常激烈,在桓宽的《盐铁论》里有集中表现。白居易的观点是桑弘羊这一派的。

这首诗在唐诗里也是另类的存在(只有元稹的观点与白居易一致)。唐代那些写“商妇怨”诗的诗人,大都对商人不抱什么敌意;但白居易对商人抱有敌意,觉得商人赚了那么多钱,对国家财政却毫无贡献,只能是国家的祸害和不幸。正因为白居易对商人抱有敌意,所以在《琵琶行》中,他一反唐代“商妇怨”诗的传统,塑造了商人“重利

轻别离”的负面形象,构筑了诗人与商妇的情感同盟,创造了不同于“商妇怨”诗的新范式。

所以,尽管白居易把自己的见解包装得非常浪漫,但《琵琶行》并不只是一首简单的浪漫诗歌,其背后有隐蔽的经济主张在起作用。把《琵琶行》跟《盐商妇》比较,跟唐代的“商妇怨”诗比较,就能发现它的基调是什么,决定其基调的原因在哪里。

读者不知不觉跟着诗人的调调走,从“商人重利轻别离”开始,中国人对商人就有了负面印象。哪怕到了今天,我们的生活高度依赖于商业,可是说起商人,还是隐隐有“重利轻别离”的成见,说明《琵琶行》还在发挥着作用。

六

也许正是从《琵琶行》中体会到了上述种种情绪,元代的马致远才创作出了《江州司马青衫泪》这出杂剧,索性把诗歌里原来隐而未显的幻想现实化了。他把诗人的“自作多情”落实,琵琶女也有了名字,姓裴,叫兴奴。白居易在长安做官,裴兴奴在长安走红,两个人在长安相爱。但是浮梁茶商刘一郎出现了,用金钱破坏了他们的关系,骗娶到了裴兴奴。后来在浔阳江头,裴兴奴巧遇白居易,演出了类似《琵琶行》的一幕。然后趁刘一郎熟睡之际,裴兴奴跟着白居易私奔了。此事一直闹到皇帝那儿,皇帝亲自做出判决:“白居易仍复旧职,裴夫人共享荣光。老虔婆决杖六十,刘一郎流窜遐方。”

这个杂剧的情节与《琵琶行》原诗几乎没有什么关系,不过,也许剧作家正是要通过这种荒唐的情节,来表示其对于原诗中诗人那隐秘幻想的洞察?正是在表现士人的幻想方面,我们认为这个杂剧与《琵琶行》在精神实质上是息息相通的,是《琵琶行》创造的商人、女人与士人三角关系新范式在杂剧里的转世投胎。

在元代,与《江州司马青衫泪》题材类似的杂剧,还有贾仲明的《李素兰风月玉壶春》《荆楚臣重对玉梳记》、阙名的《郑月莲秋夜云窗梦》等许多。在这些流行的杂剧里,很多商人都是卖茶的,这也是《琵琶行》的功劳。一直到了明初,这类题材的杂剧也仍有出现,如朱有燉的《刘盼春守志香囊怨》《兰红叶从良烟花梦》等,可见写作此类杂剧也是当时的一种风气。此外,《江州司马青衫泪》在明清时期也有不少仿作,如明朝有顾大典的《青衫记》,清朝有蒋士铨的《四弦秋》等。

商人、女人与士人的三角关系,从诗歌的领域转向了戏曲的领域,这个传承发生在不同文体之间,杂剧家发展了诗人创造的范式。元代明初乃至后代的这些戏曲家们,都在按照白居易创造的范式编写剧本。

此后,《琵琶行》所创造、元杂剧所发展的这个范式,在明清小说中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,从《琵琶行》开始的文人幻想有了升级换代的表现。

综上所述,我们把《琵琶行》放在唐代同类诗歌的背景下来看,发现它打破了原来“商妇怨”诗的传统套路;把它与白居易另一首《盐商妇》诗放在一起看,发现《琵琶行》中表现的商人、女人与士人的三角关系,其思想背景来自作者的桑弘羊式的经济主张;再把它跟后来的元杂剧、明清小说贯通起来看,才知道原来白居易已经创造了一种新的表现范式,深刻地影响了后代文人及其他各种文体的同题材作品。